

经济一体化中的后发劣势与欧盟新成员国的经济追赶

——以维谢格拉德四国 1820—2018 年的经济追赶为例*

马骏驰

内容提要:以维谢格拉德集团为代表的欧盟新成员国在 1820—2018 年的经济追赶是失败的。通过考察这些国家近二百年间参与的三次经济一体化,本文认为,经济一体化是新成员国实现经济追赶的桎梏。西欧的技术、市场和资本在经济一体化之前以及经济一体化期间推动了新成员国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制度变迁,催生了短期的经济追赶。然而,经济一体化带来的保护性市场和资本减弱了新成员国持续推进产业升级转型和经济制度改革的意愿,让这些国家陷入了“参与经济一体化——依赖经济一体化的庇护——经济发展受阻——继续寻求庇护”的路径依赖,最终拉大了其与西欧国家间生产效率的差距,造成经济追赶的失败。本文指出,这一桎梏源于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庇护。庇护替代了技术与制度的作用,而这正是经济一体化给新成员国带来的后发劣势。鉴古知今,欧洲经济一体化也许并不如欧盟所描绘的那样美好,也并不一定是促进经济追赶的法宝,甚至可能蕴含更为严重的后发劣势。

关键词:经济一体化 经济追赶 后发劣势 欧盟 中东欧

欧洲经济一体化一直被欧盟奉为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在 2014 年欧盟扩大 10 周年之际,欧盟委员会(以下简称“欧委会”)宣称,2004 年的东扩让新老成员国间的贸易额翻了三倍,2000—2008 年,新成员国的 GDP 增速每年提升 1.75%,并在 2002—2008 年为这些国家创造了 300 多万个就业岗位。^① 在 2024 年欧盟扩大 20 周年之际,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组织与制度互动视角下的中东欧政党政治与‘民主倒退’”(项目编号:21CGJ0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孙彦红研究员的指导及两位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的修改建议。

^①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2004 Enlargement—Strategic Benefits, Impact and The Current Enlargement Agenda,” European Commission, 30 April 2014,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MEMO_14_325.

欧委会宣称,新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正不断向欧盟平均水平靠拢。2004—2023年,波兰、斯洛伐克和拉脱维亚的国民总收入水平增长了7%,欧盟新成员国新增了600万个工作岗位。^① 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也表示,在这20年间,新成员国的农产品出口翻了三番,失业率下降了一半。欧盟让新成员国更加强大。^②

然而,欧盟新成员国对此持不同观点。匈牙利总理欧尔班(Orbán Viktor)在2021年表示,单一市场让德国的人均GDP增加了1046欧元,而匈牙利和波兰仅分别为408欧元和382欧元。因此,单一市场带来了成员国间的趋异而非趋同。欧尔班还认为,欧盟存在的基本前提应该是让所有成员国共赢而非个别国家获利。^③ 捷克前总统克劳斯(Václav Klaus)早在2005年就表示,捷克需要欧盟内部真实的经济趋同,而非那些不必要的名义趋同,即规则、政策、法律和标准的趋同。名义趋同将会严重阻碍真实趋同。^④ 波兰前总理卡钦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也曾警告说,多速欧洲将导致欧盟解体。^⑤ 事实上,欧盟新成员国持有这种观点并不意外,因为这些国家自转轨后几乎每隔10年就会遇到一次危机,如从1989年延宕至新千年的转轨衰退、2008—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2020年的新冠疫情危机以及2022年的俄乌冲突等。可见,欧盟新成员国在回归欧洲之后的关键词是危机应对与经济复苏。如果连可持续的稳定增长都谈不上,那经济追赶对这些国家而言更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

虽然欧盟和维谢格拉德四国对欧洲经济一体化作用的各执一词具有政治博弈的因素,但这也表明,需要进一步检验欧洲经济一体化对新成员国经济追赶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将以后发优势理论为分析工具,通过回顾新成员国在近代经济史上参与的历次经济一体化,解读新成员国的经济追赶成绩,评估经济一体化对这些国家经济追赶的影响,进而重新审视当前欧洲经济一体化对新成员国的意义。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所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

^① “20 Years of EU Membership,” European Commission, 2024, https://commission.europa.eu/20-years-together_en.

^② “Speech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a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Formal Sitting on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2004 EU Enlargement,” European Commission, 24 April 2024,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4_2282.

^③ “Viktor Orbán’s Address at the Conference ‘Thirty Years of Freedom’,” Cabinet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19 June 2021, <https://2015-2022.ministerelnok.hu/viktor-orbans-address-at-the-conference-entitled-free-for-thirty-years/>.

^④ “Speech at Jeddah Economic Forum: Czech Experience with Taking-Off,” Václav Klaus, 20 February 2005, <https://www.klaus.cz/clanky/2403>.

^⑤ “Poland’s Kaczynski Warns Two-Speed Europe Leads to ‘Breakdown’,” EURACTIV, 9 February 2017,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future-eu/news/polands-kaczynski-warns-two-speed-europe-leads-to-breakdown/>.

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①而最终是否能够抵达这一景象,则是另一个问题。

一 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经济一体化与新成员国经济追赶问题的研究聚焦于欧洲经济一体化对欧盟新成员国各类生产要素的影响。这些研究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欧洲经济一体化推动了新成员国的经济追赶,危机后的欧洲经济一体化则阻碍了经济追赶,导致了新老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逐步扩大。本文认为,可通过拉长研究时间跨度和关注内生视角的方法,进一步深化对欧洲经济一体化与新成员国经济追赶问题的认识。

(一) 国外研究概况

关于欧洲经济一体化是否促进经济追赶的问题,国外研究的共识是新成员国入盟后经济追赶效果显著。但国际金融危机后,部分研究认为新成员国的追赶速度减缓,另有部分观点认为新老成员国间的差距开始扩大。拉巴茨基(Ryszard Rapacki)利用回归模型证明,入盟推动了新成员国在1995—2013年GDP和收入水平的增长。转轨后的新成员国从较低经济水平起步,经济增速较快。入盟后这些新成员国与老成员国的收入差距继续缩小,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仅仅使这一趋同进程差异化,但并未扭转这一趋势。^②阿尔西蒂(Cinzia Alcidi)认为,2000—2015年,新成员国是欧盟内 β 趋同速度最快的国家集团,其中波罗的海三国、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表现最好; α 趋同在2000—2009年十分明显,但此后趋同停滞并于2013年起开始趋异。^③坎波斯(Nauro F. Campos)等人的研究从反面印证了上述结论。该研究认为,如果那些在1973年及此后入盟的国家没有成为欧盟成员国,那么这些国家人均GDP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水平会远低于入盟后的水平,仅希腊除外。^④另有研究指出,全球新冠疫情

^① [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② Ryszard Rapacki and Mariusz Próchniak, "The Impact of EU Membership on Economic Growth and Real Convergence of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Ekonomia Journal*, Vol.39, No.1, 2014, pp.87-122.

^③ Cinzia Alcidi,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Income Convergence in the EU," *Intereconomics*, Vol.54, No.1, 2019, pp.5-11. β 趋同指贫穷国家由于初始水平较低,倾向于比富裕国家增长得更快; α 趋同指各经济体间人均收入的离差随时间的推移而趋于下降。

^④ Nauro F. Campos, Fabrizio Coricelli and Luigi Moretti,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Estimating the Benefits from Membership in the European Union Using the Synthetic Counterfactuals Method," IZA Discussion Paper No.8162,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April 2014, <https://docs.iza.org/dp8162.pdf>.

后欧盟内的趋异继续加速。^①

关于欧洲经济一体化如何影响经济追赶的问题,国外研究认为,新成员国借助欧洲经济一体化改进了制度质量、资本吸引力、劳动力素质等要素,进而推动了经济追赶,但国际金融危机后,这些国家自身的一系列问题阻碍了其经济追赶的步伐。坎波斯等人认为,深度的欧洲一体化带来了更高的人均GDP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欧盟成员国的身份和加入欧元区所带来的更高阶段的一体化会产生更大助益。^② 祖克(Piotr Żuk)等人认为,新成员国的经济追赶主要源于一体化进程对制度质量的改善,进而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资本投入和劳动力的作用相对较小。^③ 拉巴茨基认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入是新成员国追赶的秘诀,其回归模型显示两者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性最大。^④ 国际金融危机后,相关研究不再强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而一致认为新成员国自身的问题是造成经济追赶速度减缓或趋异的根本原因。格莱维(Linda Glawe)等人提出,正是新成员国人力资本的质量和制度的差异造成了追赶失败。^⑤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同这一判断,认为成员国国内结构性改革的缺失影响了本国生产率。^⑥ 也有研究指出,危机前新成员国的债务驱动模式导致其经济追赶的不可持续性。^⑦ 还有研究将原因归咎于欧盟治理,认为欧盟经济和金融治理政策不但缺乏多样性,而且对成员国社会造成了过度干预。^⑧

(二)国内研究概况

关于欧洲经济一体化是否促进经济追赶的问题,国内研究普遍认为,国际金融危

^① Aleksandra Fedajev et al., “Has Covid-19 Pandemic Crisis Changed the EU Convergence Patterns?” *Economic Research-Ekonomska Istraživanja*, Vol.35, No.1, 2022, pp.2112-2141.

^② Nauro F. Campos, Fabrizio Coricelli and Luigi Moretti,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Estimating the Benefits from Membership in the European Union Using the Synthetic Counterfactuals Method”.

^③ Piotr Żuk et al., “Real Convergence in Central,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ECB Economic Bulletin*, Issue 3 / 2018—Articles, https://www.ecb.europa.eu/pub/pdf/other/ecb.ebart201803_01.en.pdf.

^④ Ryszard Rapacki and Mariusz Próchniak, “The Impact of EU Membership on Economic Growth and Real Convergence of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⑤ Linda Glawe and Helmut Wagner, “Convergence, Divergence, or Multiple Steady States? New Evidence on 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49, No.3, 2021, pp.860-884; Cinzia Alcidi,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Income Convergence in the EU,” pp.5-11.

^⑥ Jeffrey Frankel, “Real Convergence and Euro Adop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rade and Business Cycle Correlations as Endogenous Criteria for Joining the EMU,”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8 April 2005, <https://www.elibrary.imf.org/display/book/9781589063709/ch002.xml>; Jeffrey Franks and Hanni Schölermann, “Drifting Apart: Income Convergence in the Euro Area,”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3 September 2017, <https://www.imf.org/en/Blogs/Articles/2017/09/13/driftng-apart-income-convergence-in-the-euro-area>.

^⑦ Heribert Kohl,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10 Years since EU Enlargement,” *Transfer: European Review of Labour and Research*, Vol.21, No.3, 2015, pp.285-311.

^⑧ Ibid.

机之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差距开始拉大。丁纯指出,在经济增长速度、失业率、国际贸易收支和通货膨胀率等方面,成员国在2008年危机后显著趋异,这意味着成员国的经济差异性越来越强。初始高水平成员国的后续表现趋向于更好,而初始低水平国家则表现得更差。^①孙杰在研究了欧元区国家的趋同进程后得出相近的结论,即在危机后的8年中,欧元区成员国再次呈现出经济趋异的走势。^②何晴倩从全球价值链影响力的角度提出,欧盟边缘成员国全球价值链影响力稳步上升,且这些边缘成员国价值链影响力的上升幅度远小于核心成员国价值链影响力的下降幅度。^③

关于欧洲经济一体化如何影响经济追赶的问题,国内研究认为,各国经济结构的差异性被欧洲一体化放大,进而拖慢了新成员国经济追赶的步伐。丁纯等人认为,制造业和人口的集聚加剧外围国家的资源流失,而货币一体化提升了生产要素向发达国家的流动速度,导致外围国家外部失衡和内需不足。因此,货币一体化等因素致使欧盟各国间经济发展趋异。^④徐坡岭等人认为,高度一体化本可缓解成员国异质性带来的不利影响,但在单一货币政策下,统一的名义利率和名义汇率进一步放大了初始异质性的影响,加大了各成员国在要素市场、技术、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差异。^⑤

(三)既有研究的不足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较好地解释了欧洲经济一体化对新成员国经济追赶的影响,但仍存在不足之处。首先,相关研究需要进一步阐明欧洲经济一体化对新成员国经济追赶的真实作用。事实上,大多数有利和不利条件在新成员国正式参与欧洲经济一体化之前就已出现。在新成员国入盟前,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与制度化这四大经济转轨的核心举措已极大提高了新成员国的制度质量、外来投资吸引力等关键要素的水平,并在2000年左右成功促使这些国家重新踏上增长之路。^⑥彼时欧盟仅通过联合国协定、法尔计划等助力新成员国经济。与此同时,部分不利于追赶的条件也早已出现,例如私有化导致本土制造业的衰落和国有资本的严重流失。因此,并不是欧洲经

^① 丁纯、张铭心、杨嘉威:《“多速欧洲”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欧盟成员国发展趋同性的实证分析》,载《欧洲研究》,2017年第4期,第1-17页。

^② 孙杰:《论欧元区的波动发展——冲击的异质性影响与趋同的理论逻辑》,载《欧洲研究》,2021年第1期,第1-27页。

^③ 何晴倩:《强化还是弱化?欧盟“核心—边缘”关系的再审视——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载《欧洲研究》,2021年第5期,第53-83页。

^④ 丁纯、杨嘉威:《欧洲经济治理体制的问题、改进和前景》,载《国际论坛》,2019年第1期,第33-49页。

^⑤ 徐坡岭、贾春梅:《欧元区经济增长分化的原因与发生机制:通货膨胀视角》,载《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1期,第111-120页。

^⑥ 参见孔田平:《东欧经济改革之路——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济一体化创造了这些条件,更不是只有在欧洲经济一体化时期这些条件才发挥了作用。可见,欧洲经济一体化对新成员国经济追赶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夸大了。

其次,相关研究需要进一步拉长时间跨度,以更好地解释原本就属于长期研究议题的经济追赶。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德国人均GDP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与英国的水平相当,这是一个长达二百年的追赶进程;瑞典等北欧国家也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超越德国;法国经济则在经历大革命这种制度转轨后耗费了一个世纪才彻底复苏。因此,一个国家向更富裕国家的经济追赶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更不是一个短期的研究议题。更重要的是,战后欧洲推行的经济一体化并非新成员国所参与的、唯一的经济一体化体系。巴拉萨(Béla Balassa)将经济一体化分为五个阶段: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单一市场、经济联盟和单一货币的完全一体化。^①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欧盟新成员国在近两个世纪以来数次参与了经济一体化,例如欧洲各大帝国的关税同盟、经济互助委员会、欧洲单一市场。因此,如要研究欧洲经济一体化对经济追赶的影响轨迹,不应只关注新成员国2004年加入的欧洲经济一体化。

最后,相关研究需要进一步从新成员国内生性视角出发来考察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既有研究一度认为,东欧转轨、欧盟东扩及随之而来的欧洲经济一体化极大促进了新成员国的经济复苏与增长,也让各国对缩小与老欧洲的经济差距抱有热切期望。然而,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后,已有研究却变得更加保守,一方面公认新成员国的追赶速度减缓或彻底趋异,另一方面开始探讨新成员国自身因素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在短短数年间,研究结论的变化十分明显,但并未说明为何新成员国的自身因素在国际金融危机前没有成为起主导作用的负面因素,反而在危机后才得以显现。已有研究的突然转向甚至会造成一种错觉,即欧洲经济一体化对新成员国经济追赶的影响,是随着短期经济数据的变化而变化的。

二 后发优势理论和本文研究思路

后发优势理论是研究经济追赶问题的经典理论之一。本文将以此为分析框架,还原新成员国在1820—2018年经济追赶的真实成绩,并重点研究在近两个世纪内这些国家参与的历次经济一体化,进而加深对该研究议题的认识并对后发优势理论做适当

^① Béla Balass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61, pp.1-10.

补充。

(一)后发优势理论的核心思想

后发优势理论认为,后发国家存在后发优势的潜力,但这一潜力不会自动实现,经济追赶亦如此。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20世纪60年代正式提出了后发优势概念。他认为,相对的经济落后并非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劣势,它也有积极作用,可以转化为一种优势。落后的程度越大,推动工业化发展的力量就越大,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也就越大。^①然而,经济史上成功实现经济追赶的案例屈指可数,跨越(Leapfrogging)则更为罕见。这表明,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并非一定能够实现。阿布拉莫维茨(Moses Abramovitz)率先区分了后发优势的“潜力”和“实现”两个概念,认为经济追赶不会自动实现,后发国家的追赶潜力也不仅仅是由落后程度决定的。^②樊纲也提出,后发优势在经济追赶中所起的作用,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量的差别。在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其表现的形式也不一。^③贾根良则从研究范式的角度阐释了这一问题,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假定前提条件,如技术、制度、偏好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一国的经济系统内部不断演化。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与这些国家经济系统的内生演化息息相关。^④

技术和制度是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追赶的核心条件。佩蕾丝(Carlot Perez)提出,后发国家存在两个追赶的机会窗口。在先发国家的生产体系进入成熟期时,产品的技术变得标准化,知识和技能趋于公开或者可以以一定价格出售,这就为后发国家提供了第一个机会窗口,即通过吸收先进技术开展产业升级转型以进入已有生产体系。但当新的技术和信息出现时,那些已经积累了巨大优势的企业和国家需要支付成本才能丢弃旧的经验以获取新的经验,这会造成经济和制度之间关系的破裂和再度耦合,而那些具有新知识和新技能的后发国家会更快速地继续进行制度创新以掌握新的经验。这就是第二个机会窗口,即转换期的追赶机会。^⑤其他研究也肯定了技术和制度的作用。例如罗默(Paul M. Romer)和阿罗(Kenneth J. Arrow)提出“干中学”(Learning by

① [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iv页。

② Moses Abramovitz, "Catching Up, Forging Ahead, and Falling Behind,"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46, No.2, 1986, pp.385-406.

③ 樊纲:《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载《管理世界》,2023年第2期,第13-21页。

④ 参见贾根良:《理解演化经济学》,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33-41页;贾根良:《后发优势的演化创新观》,载《陕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70-75页。

⑤ [英]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田方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4页;[英]C.佩蕾丝、[荷]L.苏蒂:《技术上的追赶:进入壁垒和机会窗口》,载[意]G.多西等编:《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钟学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66-592页。

Doing),认为一切在生产研发过程中所创造的新知识,均可以构成经济体的知识增量,进而提高该国的社会生产水平。^① 杨小凯从反面论证了制度的重要性,认为忽视制度建设的后发国家会产生后发劣势,例如苏联模仿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模式,但缺乏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因此,苏联经济发展的长期代价超过了短期收益,这就是后发劣势。后发国家只有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②

经济史上数个成功案例印证了技术与制度对经济追赶的影响。纳尔逊(Richard R. Nelson)对德国的案例研究表明,由于德国大学和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强,合成染料行业的兴起带动了德国有机化学乃至整个化工工业的发展。^③ 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对日本的案例研究表明,真正起作用的是各国对国际经验的借鉴能力。各国在国家创新系统中所做出的制度性变革影响了国家生产、投资和营销活动的组织方式。^④ 诺斯(Douglass North)研究了英国对西班牙的经济追赶历程并提出,各国的制度及制度产生的交易费用是西方经济兴起的关键,其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组织效率的高低。^⑤

(二) 本文的研究思路

首先,本文根据经济的长期数据考察新成员国经济追赶的真实成绩。后发优势理论对经济追赶问题的研究是基于经济史的研究。格申克龙、诺斯、纳尔逊等人正是基于对英国、德国、俄罗斯等历史上后发国家的经济史提出了后发优势等理论。格申科龙指出,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本质是把各种通过经验方法推导的、假想的一般结论,应用于经验材料并检验其吻合程度,以期弄清楚某些确实存在一致性的、典型的情况以及在这些典型情况之下单个要素之间的典型关系。^⑥ 就本文的研究议题而言,战后的欧洲经济一体化并非建立在“废墟之上”,而是诞生于各国漫长的经济发展基础之上。

^① Paul M. Rome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4, No.5, 1986, pp.1002-1037; Paul M. Romer,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8, No.5, pp.71-102; K. J. Arrow,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 in F. H. Hahn, eds., *Reading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A Selection of Papers from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Palgrave Macmillan, 1971, pp.131-149.

^② 杨小凯:《后发劣势》,载张曙光编:《思考变迁:经济讲演录》,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47页; [美]Jeffery Sachs,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载《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4期,第961-988页。

^③ Richard R. Nelson, “Why do Firms Differ, and How does It Matter?”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12, No.S2, 1991, pp.61-74.

^④ [英]克里斯托夫·弗里曼:《技术政策与经济绩效——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经验》,张宇轩译,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7页。

^⑤ 参见[美]道格拉斯·诺斯、[美]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⑥ [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第10页。

考察新成员国的经济追赶应联系这些国家在参与欧洲经济一体化之前所呈现的经济发展状况,这可以使我们不再把某个关键条件视为战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结果,而是作为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历程中的组成部分,进而辨明欧洲经济一体化对新成员国经济追赶的真实作用。将欧洲经济一体化视为影响新成员国经济追赶的单一因素,显然欠缺说服力。

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的时间跨度扩展至 1820—2018 年。在经济史研究中,19 世纪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自 19 世纪起,英国的蒸汽技术逐步被应用于各大产业,进而引发第一次工业革命。借此,欧洲国家先后开启了工业化进程,也出现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分化。因此,本文选择将 19 世纪作为研究时段的起点。

其次,本文将把新成员国工业转型和经济制度变迁作为重点分析对象,挖掘变化背后的连续性影响因素。后发优势理论对经济追赶问题的研究是基于经济演化的分析。贾根良指出,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对“存在”的研究,后发优势理论对经济追赶问题的研究关注后发国家的“创造”,这是一种演化创新观。^① 纳尔逊指出,“演化”是对长期的、渐进的变化过程的关注。在现实中观察到的规律,不应被解释为对静态问题的解决方法,而应被解释为一个动态过程和某个阶段的特点。^② 就本文的研究议题而言,虽然近两个世纪以来,新成员国经历了巨大的内外部环境变化,数不胜数的因素影响了其经济发展历程,但在长期的、渐进的演化背后,必定存在某种连续性的因素,或可称为路径依赖。当然,本文并不否认如新成员国“休克式疗法”的革命性变化,强调连续性仅为了说明,将历史中曾存在的某些因素纳入当前的研究视野是有益的。

最后,本文尝试对后发优势理论,特别是对后发劣势的学说进行一定程度的拓展和补充。杨小凯认为,后发劣势源自对先发国家制度模仿得不到位。制度是后发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因素。但也有观点认为制度仅是影响因素之一。例如林毅夫提出,后发国家的发展战略更为重要,不必模仿先发国家的制度体系。^③ 制度经济学鼻祖凡伯伦(Thorstein B. Veblen)更是直接否定了制度模仿的作用,认为德国正是因为没有模仿英国的制度体系,才能在无制度重负的条件下实现对英国的经济赶超。^④ 就本文的研究议题而言,新成员国在不同时期多次模仿了不同的制度体系或某种制

① 参见贾根良:《理解演化经济学》,第 33-41 页;贾根良:《后发优势的演化创新观》,第 70-75 页。

② [美]理查德·R. 纳尔逊、[美]悉尼·G. 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胡世凯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4-15 页。

③ 林毅夫:《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载《经济学(季刊)》,2003 年第 2 卷第 4 期,第 989-1004 页。

④ 贾根良:《后发优势的演化创新观》,第 70-75 页。

度,例如苏东时期全面引入苏联的政治经济体系,转轨后全面移植了西方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那么,新成员国两次制度模仿以及两种制度之间的制度转轨,也可以成为检验、补充后发优势理论的有效方法。

(三) 本文的核心概念

1. 经济一体化

瓦伊纳(Jacob Viner)最早提出“经济一体化”概念。他认为,关税同盟的建立将引发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在关税同盟内部,即便是损失了高效率的外部贸易伙伴,贸易创造的收益仍可能会超过贸易转移造成的损失。^①在此基础上,巴拉萨提出了其经典的经济一体化理论。他认为,经济一体化既是一个进程,也是一种状态。作为一个进程,经济一体化是为了消除属于不同民族国家经济单位之间的歧视性措施;作为一种状态,经济一体化表现为各国经济之间歧视的消弭。经济一体化存在多种形式: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单一市场、经济联盟和单一货币的完全一体化。巴拉萨特别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例如比荷卢经济联盟、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拉美自由贸易协会、经济互助委员会等纷纷建立。^②他还进一步深化了瓦伊纳关于贸易与经济一体化关系的论述,认为不仅存在贸易的经济一体化,而且存在生产和发展的一体化。鉴于巴拉萨的经济一体化理论应用更为广泛,本文将按照这一定义来界定欧盟新成员国参与的经济一体化。^③

2. 作为后发国家的欧盟新成员国

后发国家是一个相对于先发国家的动态概念。欧盟新成员国虽然已被世界银行定义为高收入国家(除保加利亚外),但相对老成员国而言,它们的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更低,工业化的时间也更晚。^④在老成员国受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如火如荼地开展工业化之时,大多数新成员国却被排除在这一趋势之外,被农奴制、贵族特权、专制统治、反商业和资本主义情绪等前现代社会制度所充斥。直到19世纪的最后

^① Paul Oslington, “Contextual History, Practitioner History, and Classic Status: Reading Jacob Viner’s the Customs Union Issu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Vol.35, No.4, 2013, pp.491-515.

^② Béla Balass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pp.1-10.

^③ 经济互助委员会是一个失败的经济一体化实验。虽然经济互助委员会与西方的经济一体化有所不同,例如其成员国间的合作并不是以市场为经济协调机制,但1962年经济互助委员会正式提出要合理化成员国的国际分工和加强成员国中央计划的协调,进而建立统一的经济计划。可见,其最终目的无疑是加强经济互助委员会理事会的权力,并让成员国让渡部分主权进而加深经济一体化。所以,本文将经济互助委员会也列入新成员国参与过的经济一体化之一。

^④ “World Bank Country and Lending Groups,” The World Bank, <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world-bank-country-and-lending-groups>.

30年,工业化这一“时代精神”才蔓延至新成员国地区。^①因此,欧盟新成员国相对老成员国而言,仍可被定义为后发国家。

本文的“欧盟新成员国”主要是指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四个国家。原因有二:一是经济体量。根据欧盟统计局的统计数字,2023年波兰、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GDP之和占欧盟新成员国GDP总和的64.5%(含2004年及此后入盟的国家)。^②如果波兰等经济大国的经济追赶都以失败告终,那么体量较小的新成员国可能更加依赖经济一体化而更难以成功追赶。二是长期经济数据的可比性和连续性。只有在计算方法一致的前提下,长期的人均GDP数据才存在可比性。因此,本文的大部分经济数据源自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权威数据库——麦迪森经济史数据库(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遗憾的是,在1820—2018年,除上述四国外,其余欧盟新成员国或因独立时间较短或因缺少长期经济数据而难以被纳入考察范围。此外,为了行文连贯和用词统一,本文的“新成员国”和“老成员国”也泛指历史上的相关国家及其所在地区,而非专指当前欧盟成员国。

三 新成员国在经济一体化中的经济追赶成绩

根据麦迪森经济史数据库的统计数据,本部分分析了欧盟新成员国1820—2018年的经济追赶成绩。^③新成员国与西欧和德国的人均GDP及GDP数据的比较表明,作为后发国家的新成员国在1820—2018年的经济追赶是失败的,即这些国家与西欧的差距并无明显变化,与德国的差距显著扩大。^④此外,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内,这些

^① [匈]伊万·拜伦德:《20世纪欧洲经济史:从自由放任到全球化》,徐昂译,格致出版社2020年版,第33-35页。

^② “GDP and Main Components (Output, Expenditure and Income),” Eurostat, 2023, 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nama_10_gdp/default/table?lang=en.

^③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该数据库已将中东欧国家在19—21世纪的领土变化等因素纳入统计计算的方法。第二,该数据库在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后仍将该国作为一个经济统计意义上的经济对象。笔者认为,鉴于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的时间远长于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国,采用捷克斯洛伐克的数据更有助于本文的研究。在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后,笔者将捷克、斯洛伐克与捷克斯洛伐克的统计数据共同列出。第三,该数据库的“西欧”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瑞士、英国、爱尔兰、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

^④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本文使用人均GDP衡量新成员国的经济追赶。原因有二:一是人均GDP是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最主要指标之一;二是虽然衡量经济追赶有多种指标,但除该指标和GDP数据外,极少有数据能够在1820—2018年近两个世纪的时间中保证连续性。第二,本文的“经济追赶”是指新成员国在绝对意义上的追赶,即如果新成员国人均GDP与西欧和德国人均GDP差距显著缩小,则追赶成功,反之则失败。第三,由于时间跨度较长且篇幅有限,表1至表5将以每10年为一个间隔。

国家的追赶进程存在明显起伏,而非线性递减或递增。

(一)经济追赶的长期结果

如果仅比较 1820 年和 2018 年两个时间点的数据,那么欧盟新成员国在两百年间确实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追赶。一是波兰和捷克人均 GDP 的增速高于西欧人均 GDP 的增速。根据表 1,1820—2018 年,波兰人均 GDP 增长了 3256.3%,捷克斯洛伐克增长了 2087.8%,西欧的增速为 1624.8%。仅有匈牙利在 1870—2018 年增长了 1371.9%,低于西欧的平均水平。二是新成员国占西欧人均 GDP 的比例也有所提高。根据表 2,1820—2018 年,波兰人均 GDP 占西欧的比例增长了 94.4%,同期捷克斯洛伐克的增幅为 27%,匈牙利在 1870—2018 年的占比增长了 22.2%。但相对德国而言,仅有波兰实现了十分有限的追赶。如表 3 所示,波兰占德国人均 GDP 的比例在 1820—2018 年增长了 7.5 个百分点,捷克斯洛伐克下滑了 22 个百分点,匈牙利则下滑了 4.1 个百分点。

然而,这种计算方法并未反映真实情况。一方面,当前新成员国人均 GDP 占西欧的比例与历史峰值相比并无明显差别。波兰在 1820—1920 年的第一个百年内成功将占比从 35.5%提高到了 61.4%,这一比例在 1920—2018 年的第二个百年内变为 69%。这意味着,相对一个世纪前的历史峰值,该国在 2018 年的占比提高了 7.6 个百分点。匈牙利占比的历史峰值在 1910 年达到 62.1%,2018 年为 64.4%,仅提高了 2.3 个百分点。捷克斯洛伐克却从未恢复至历史峰值,其 1950 年的占比达 76.8%,而 2018 年为 74.4%,下滑了 2.4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当前新成员国人均 GDP 占德国的比例与历史峰值差距较大。历史上最趋近德国人均 GDP 的是捷克斯洛伐克,该国曾在 1820 年和 1950 年两次达到 90%左右的水平,但到 2018 年仅为 64.1%。波兰在 1920 年的人均 GDP 水平达到德国的 67.3%,而 2018 年的占比下滑至 59.5%。匈牙利在经历 1950 年的峰值 63.9%之后下滑至 2018 年的 55.5%。因此,如果考察 1820—2018 年的数据波动就会发现,新成员国的人均 GDP 并未实现向西欧的追赶,与德国的差距甚至逐步扩大。

表 1 1820—2018 年新成员国与西欧和德国人均 GDP 比较 (单位:2011 年不变价国际元)

年份 国家(地区)	1820 年	1830 年	1840 年	1850 年	1860 年	1870 年	1880 年	1890 年	1900 年
西 欧	2307	2384	2580	2678	3034	3301	3585	4079	4724
德 国	1572			2276	2613	2931	3174	3870	4758
波 兰	818	942	907	985	1358	1575	1886	2204	2700
匈 牙 利						1741		2348	2681
捷克斯洛伐克	1353			1720		1855		2399	2756
捷 克									
斯洛伐克									
年份 国家(地区)	1910 年	1920 年	1930 年	1940 年	1950 年	1960 年	1970 年	1980 年	1990 年
西 欧	5135	4884	6409	7185	7263	10974	16161	20950	25440
德 国	5337	4457	6333	8612	6186	12282	17277	22497	25391
波 兰	2694	3000	3178	3478	3900	5125	7058	9149	8150
匈 牙 利	3188	2724	3832	4186	3953	5816	8015	10052	10296
捷克斯洛伐克	3174	3081	4664	4594	5581	8142	10307	12723	13570
捷 克							8748	12336	14178
斯洛伐克									
年份 国家(地区)	2000 年	2010 年	2018 年						
西 欧	32536	37318	39790						
德 国	33367	41110	46178						
波 兰	12732	20609	27455						
匈 牙 利	13129	20036	25623						
捷克斯洛伐克	15378	24573	29601						
捷 克	17056	25922	30749						
斯洛伐克	13905	21941	27076						

数据来源:麦迪森经济史数据库, <https://www.rug.nl/egdc/historicaldevelopment/maddison/releases/maddison-project-database-2020?lang=en>。

表2 1820—2018年新成员国人均GDP占西欧平均水平的比例(单位:%)

年份 国家(地区)	1820年	1830年	1840年	1850年	1860年	1870年	1880年	1890年	1900年
波兰	35.5%	39.5%	35.2%	36.8%	44.8%	47.7%	52.6%	54.0%	57.2%
匈牙利						52.7%		57.6%	56.7%
捷克斯洛伐克	58.6%			64.2%		56.2%		58.8%	58.3%
捷克									
斯洛伐克									
年份 国家(地区)	1910年	1920年	1930年	1940年	1950年	1960年	1970年	1980年	1990年
波兰	52.5%	61.4%	49.6%	48.4%	53.7%	46.7%	43.7%	43.7%	32.0%
匈牙利	62.1%	55.8%	59.8%	58.3%	54.4%	53.0%	49.6%	48.0%	40.5%
捷克斯洛伐克	61.8%	63.1%	72.8%	63.9%	76.8%	74.2%	63.8%	60.7%	53.3%
捷克							54.1%	58.9%	55.7%
斯洛伐克									48.6%
年份 国家(地区)	2000年	2010年	2018年						
波兰	39.1%	55.2%	69.0%						
匈牙利	40.4%	53.7%	64.4%						
捷克斯洛伐克	47.3%	65.8%	74.4%						
捷克	52.4%	69.5%	77.3%						
斯洛伐克	42.7%	58.8%	68.0%						

注:表由作者根据麦迪森经济史数据库的统计数据自行计算。

表3 1820—2018年新成员国人均GDP占德国水平的比例(单位:%)

年份 国家(地区)	1820年	1830年	1840年	1850年	1860年	1870年	1880年	1890年	1900年
波兰	52.0%			43.3%	52.0%	53.7%	59.4%	57.0%	56.7%
匈牙利						59.4%		60.7%	56.3%
捷克斯洛伐克	86.1%			75.6%		63.3%		62.0%	57.9%
捷克									
斯洛伐克									
年份 国家(地区)	1910年	1920年	1930年	1940年	1950年	1960年	1970年	1980年	1990年
波兰	50.5%	67.3%	50.2%	40.4%	63.0%	41.7%	40.9%	40.7%	32.1%
匈牙利	59.7%	61.1%	60.5%	48.6%	63.9%	47.4%	46.4%	44.7%	40.5%
捷克斯洛伐克	59.5%	69.1%	73.6%	53.3%	90.2%	66.3%	59.7%	56.6%	53.4%
捷克							50.6%	54.8%	55.8%
斯洛伐克									48.7%
年份 国家(地区)	2000年	2010年	2018年						
波兰	38.2%	50.1%	59.5%						
匈牙利	39.3%	48.7%	55.5%						
捷克斯洛伐克	46.1%	59.8%	64.1%						
捷克	51.1%	63.1%	66.6%						
斯洛伐克	41.7%	53.4%	58.6%						

注:表由作者根据麦迪森经济史数据库的统计数据自行计算。

表4 1820—2018年新成员国GDP占西欧平均水平的比例(单位:%)

年份 国家(地区)	1820年	1830年	1840年	1850年	1860年	1870年	1880年	1890年	1900年
波兰	2.8%			2.9%		4.3%			6.1%
匈牙利						1.7%			1.7%
捷克斯洛伐克	3.4%			3.6%		3.1%			3.0%
捷克									
斯洛伐克									
年份 国家(地区)	1910年	1920年	1930年	1940年	1950年	1960年	1970年	1980年	1990年
波兰		5.7%		5.0%	4.4%	4.3%	4.1%	4.3%	3.3%
匈牙利		1.7%		1.9%	1.7%	1.6%	1.5%	1.4%	1.1%
捷克斯洛伐克		3.2%		3.3%	3.2%	3.1%	2.6%	2.5%	2.2%
捷克							1.5%	1.7%	1.5%
斯洛伐克									0.7%
年份 国家(地区)	2000年	2010年	2018年						
波兰	3.9%	5.2%	6.3%						
匈牙利	1.1%	1.3%	1.6%						
捷克斯洛伐克	1.9%	2.6%	2.8%						
捷克	1.4%	1.8%	1.9%						
斯洛伐克	0.6%	0.8%	0.9%						

注:表由作者根据麦迪森经济史数据库的统计数据自行计算。

表 5 1820—2018 年新成员国 GDP 占德国水平的比例(单位:%)

年份 国家(地区)	1820 年	1830 年	1840 年	1850 年	1860 年	1870 年	1880 年	1890 年	1900 年
波兰	21.8%			16.7%		23.1%		27.3%	25.8%
匈牙利						9.0%		8.4%	7.4%
捷克斯洛伐克	26.5%			20.7%		16.4%		14.7%	12.9%
捷克									
斯洛伐克									
年份 国家(地区)	1910 年	1920 年	1930 年	1940 年	1950 年	1960 年	1970 年	1980 年	1990 年
波兰	21.4%	26.5%	21.7%	17.4%	22.9%	17.0%	17.1%	18.5%	15.4%
匈牙利	7.3%	8.0%	8.0%	6.5%	8.7%	6.5%	6.2%	6.1%	5.3%
捷克斯洛伐克	12.3%	14.7%	15.8%	11.2%	16.3%	12.5%	11.0%	11.0%	10.5%
捷克							6.4%	7.2%	7.3%
斯洛伐克									3.2%
年份 国家(地区)	2000 年	2010 年	2018 年						
波兰	18.0%	23.6%	27.1%						
匈牙利	4.9%	6.0%	6.9%						
捷克斯洛伐克	8.8%	11.6%	12.2%						
捷克	6.4%	8.1%	8.4%						
斯洛伐克	2.7%	3.5%	3.8%						

注:表由作者根据麦迪森经济史数据库的统计数据自行计算。

GDP 的比较进一步验证了新成员国经济追赶的失败。一方面,新成员国 2018 年的 GDP 占西欧平均水平的比例或落后于历史峰值,或微弱高出历史峰值。由表 4 可知,捷克斯洛伐克的占比与其历史峰值的差距最大,从 1850 年的 3.6% 下滑至 2018 年的 2.8%。匈牙利在 1940 年经历了历史峰值的 1.9%,而后下滑至 2018 年的 1.6%。波兰在 2018 年的占比(6.3%)超过了 1900 年的历史峰值 6.1%,但也仅增加了 0.2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新成员国 GDP 占德国水平的比例变化与历史峰值差距较大。如表 5 所示,在 1820—2018 年,波兰经历了数次 25% 左右的波峰,其中 1890 年的比例最高(27.3%),并于 2018 年又恢复到这一水平(27.1%)。捷克斯洛伐克从 1820 年的历史峰值 26.5% 一路下滑至 2018 年的 12.2%。匈牙利占比的变化幅度较小,其在 1870 年和 1950 年两次经历水平相近的波峰(近 9%),到 2018 年回落至 6.9%。

(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新成员国的经济追赶表现

为了发掘新成员国经济追赶与经济一体化的关联性,本部分梳理了新成员国在参与经济一体化期间的经济表现及其特点。如表 6 所示,新成员国在 19 世纪、20 世纪和 21 世纪分别参与了三次经济一体化。通过对各国人均 GDP 的比较可以发现,虽然前两次经济一体化分处不同时代且经济制度迥异,但新成员国经济追赶的特点展现出一定的共性,即经济一体化期间的追赶表现并不稳定,或在经济一体化前期快速追赶而后期严重放缓,或持续与西欧和德国拉开差距。因此可以认为,新成员国近两个世纪的经济追赶以失败告终。

具体而言,新成员国在 19 世纪的关税同盟时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追赶,但后期追赶速度明显放缓。由表 6 可知,新成员国普遍在 19 世纪 50 年代便已融入与各大帝国的经济一体化。如从 1850 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 1910 年,波兰人均 GDP 的增幅最大,达到 173.5%,高于西欧(91.7%)和德国(134.5%)。匈牙利在 1870—1910 年的增幅为 83.1%,也高于同期的西欧(55.5%)和德国(82.1%)。但波匈两国人均 GDP 的增幅在关税同盟后期明显下降。在头 20 年中(1850—1870 年),波兰的增速(59.9%)远高于西欧(23.3%)和德国(28.8%),而在后 20 年(1890—1910 年),波兰的增速(22.2%)低于西欧(25.9%)和德国(37.9%)。匈牙利同样放缓了追赶的步伐。捷克斯洛伐克则较为特殊。由于早在 18 世纪下半叶便已加入奥地利帝国的关税同盟,捷克斯洛伐克在 19 世纪的经济追赶进程疲态尽显。1850—1910 年,捷克斯洛伐克人均 GDP 增幅为 84.5%,远落后于西欧和德国。

表 6 新成员国自 19 世纪至今参与过的经济一体化体系

国 家	19 世纪	20 世纪	21 世纪
波 兰	波兰会议王国于 1851 年与俄罗斯帝国建立关税同盟;波森大公国于 1818 年与普鲁士建立自贸区,于 1866 年正式成为德意志关税同盟的一员;奥属波兰于 1851 年与奥匈帝国中的匈牙利王国建立关税同盟	1949 年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	自 2004 年起逐步加入欧洲单一市场
匈 牙 利	1784 年匈牙利王国与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建立关税同盟;1850 年匈牙利王国与奥地利帝国建立关税同盟	1949 年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	自 2004 年起逐步加入欧洲单一市场
捷克斯洛伐克	1775 年波希米亚王国和莫拉维亚侯国与奥地利帝国建立关税同盟	1949 年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	自 2004 年起逐步加入欧洲单一市场(捷克与斯洛伐克作为两个独立的成员国);斯洛伐克 2009 年引入欧元,加入欧洲经货联盟

注:表由作者自制。

在 20 世纪的经济互助委员会时期,新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开始与西欧和德国渐行渐远,且在经济互助委员会后期,这一差距日益加大。如以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的第一年 1950 年为起点,至东欧剧变后的第一年 1990 年,西欧和德国人均 GDP 的增幅令人瞩目,分别为 250.3% 和 310.5%。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则相形见绌,增幅分别为 109%、160.5% 和 143.1%。更为严重的是,与 19 世纪关税同盟时期的情况类似,新成员国在经济互助委员会后期的增幅进一步缩水。1950—1960 年,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均 GDP 增幅尚能接近西欧水平(51.1%),分别为 47.1% 和 45.9%,波兰略低,为 31.4%。但在 1980—1990 年,这些国家全面落后。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增幅仅为 2.4% 和 6.7%,波兰甚至呈现衰退趋势(-10.9%),而西欧为 21.4%,德国为 12.9%。

新成员国在 21 世纪加入单一市场后重新开启了追赶进程。如以 2005 年新成员国入盟后的第一年为起点,至 2018 年,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均 GDP 的增幅均超过德国(27.5%),分别为 76.2%、41.2% 和 49.7%。^① 得益于此,新成员国人均 GDP 占西欧和德国的比例也在持续升高。然而,由于东欧剧变后的初始水平较低,新成员国在单一市场下的经济追赶仅仅是让这些国家回到了与西欧和德国曾经的经济差距水平。

四 经济一体化对新成员国经济追赶的影响

前述分析表明,新成员国在经济一体化中的经济追赶是不稳定的。如果经济一体化真的能够影响经济追赶,那么这一影响机制必须能够解释经济追赶的不稳定,即为何存在短期的成功和长期的失败。本部分提出,西欧的技术、市场和资本在经济一体化之前以及一体化期间均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新成员国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制度的变迁,带来了短期的经济追赶。但从长远来看,经济一体化带来的保护性市场和资本削弱了新成员国持续推进产业升级转型和改进经济制度的意愿,让这些国家陷入了“参与经济一体化——依赖经济一体化的庇护——经济发展受阻——继续寻求庇护”的路径依赖,最终关闭了新成员国实现经济追赶的机会窗口。

(一) 成功但短暂的经济追赶

短期而言,西欧的技术和市场推动了新成员国的经济制度变迁,而西欧主导的经济一体化又通过提供市场和资本的方式改变了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让后者融入先发国家已有的生产体系,进而引发了经济追赶。

19 世纪上半叶,新成员国在西欧技术和市场的激励下变革了经济制度,为融入西欧的生产体系打下制度基础。在 19 世纪初未正式参与各大帝国的关税同盟之前,这些新成员国处于因经济制度而落后的发展阶段。与西欧在 15—17 世纪陆续废除农奴制不同,彼时新成员国的国王与贵族结成的联盟,为了维持农业收益,选择延续农奴制并打压新兴资产阶级。即便是在波兰立陶宛联邦这样拥有相对开放的贵族民主制(Golden Liberty)国家,波兰贵族也推动国家出台了相关法律,以限制商人和市民

^① 麦迪森经济史数据库, <https://www.rug.nl/ggdc/historicaldevelopment/maddison/releases/maddison-project-database-2020?lang=en>。

(Burgher)拥有土地等资产的权力,防止这两个阶层成为竞争对手。^①正如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言,新的君主制不可动摇地确保了贵族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贵族的社会权利不受任何崛起的资产阶级的限制。因此,东欧的制度建立在农奴制之上。^②19世纪30—40年代,蒸汽动力技术传入新成员国并激发了多瑙河双向航运通道和铁路网络的建设,进而为这些国家打开了新的出口市场。为了安抚农民群体并从新出口市场获得收益,新成员国的国王和贵族转而支持废除农奴制。因此,匈牙利王国和奥属波兰在1848年、俄属波兰会议王国在1864年纷纷完成这一制度的变革。而波希米亚王国和莫拉维亚侯国以及波森大公国早在19世纪初就已分别成为奥地利帝国和普鲁士帝国的工业区,所以早在1811年就废除了农奴制。

19世纪50年代,各大帝国主导的关税同盟激发了新成员国的初始工业化进程,让这些国家融入帝国的生产体系。随着新成员国与各大帝国的经济联系愈发紧密,加之德意志关税同盟(Deutscher Zollverein)的成功,匈牙利王国与奥地利帝国在1850年、波兰会议王国与沙俄帝国在1851年、奥地利属波兰与匈牙利王国在1851年分别建立关税同盟。而组成当今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两个部分波希米亚王国和莫拉维亚侯国早在1775年就与奥地利帝国建立了关税同盟。加入关税同盟后,新成员国的纺织业、以制粉和制糖为主的食物加工业和以采矿冶金为主的重工业迅速崛起,并成为各大帝国市场的主要供应者。例如波兰会议王国的罗兹借助关税同盟带来的市场一跃成为欧洲最大的纺织业中心之一。1880—1895年,波兰会议王国供应了整个沙俄帝国40%的煤矿产量和23%的钢铁产量,其纺织品更是几乎垄断了沙俄市场。^③匈牙利王国的农产品和食物加工业几乎全部出口奥匈帝国市场。到了1912年,其对奥地利出口的小麦占小麦总出口的99.8%,面粉占比为97.9%,玉米占比为89.2%,生牛及牛肉制品占比为79.9%。^④

新成员国在21世纪欧洲单一市场时期的经济追赶完全延续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① Péter Gunst, "Agrarian System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Daniel Chirot ed., *The Origins of Backwardness in Eastern Europ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from the Middle Ages until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p.53-91.

② Perry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e State*, Verso, 1979, p.430.

③ Jawad Daheur, "Productive or Extractive Periphery? Russian Poland and Timber Exports to Germany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Global Environment*, Vol.15, No.1, 2022, pp.107-147.

④ David Turnock, *The Economy of East Central Europe, 1815—1989: Stages of Transformation in a Peripheral Region*, Routledge, 2006, pp.54-55.

的路径。首先,这些国家在西欧技术和市场的激励下变革了经济制度,为融入西欧的生产体系打下制度基础。在未加入单一市场之前,新成员国同样处于因经济制度而落后的发展阶段。这些国家的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从根本上排除了价格信号,缺乏有效的经济协调机制,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低下的经济效率。此时,新成员国急需借助西欧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提高经济竞争力,改善经济困境。虽然波兰和匈牙利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就启动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但这些改革无法解决经济制度本身的问题,收效甚微。直到1986年,欧共体正式发出希望改善与新成员国经济关系并建立自贸区的倡议,得到了新成员国的积极响应。例如波兰在1989年9月和1991年12月分别签署了《波兰与欧洲经济共同体贸易、商业和经济合作协定》和《波兰与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的联系国协定》。此后,1993年,欧盟理事会正式将哥本哈根标准作为新成员国加入欧盟的条件。该标准再次要求这些国家建立有效运行的市场经济制度,且有能力应对竞争压力与市场力量。^①2004年8月,即新成员国入盟仅3个月之际,欧盟委员会的评估报告指出,新成员国已落实了2683项欧盟指令中的94%,并在公共采购、国家补贴、网络型工业私有化(如通信、邮政)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②可见,在欧共体的激励下,这些新成员国在正式加入欧盟之前就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转轨,并实现了本国经济制度向单一市场制度的趋近。

加入单一市场再次改变了新成员国的产业结构,让这些国家融入欧洲产业链。加入单一市场后,以机械和交通设备制造业为主的产业迅速借助西欧跨国企业的投资成为新成员国的核心产业。据统计,1995年捷克和匈牙利外来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例分别为12.2%和27%,到了2004年分别为43.4%和57.4%,在2018年为78.9%和161.2%,^③其主要投资来源国是德国、奥地利、法国、英国、荷兰等。在外资的影响下,转轨后波兰的汽车、金属制品、通信设备、化工等部门迅速崛起。目前,汽车制造业是波兰最大的工业部门,其2018年的产出占本国GDP的4%,占总工业产出的11%。^④

^① “Accession Criteria (Copenhagen Criteria),” EUR-Lex, 1993, <https://eur-lex.europa.eu/EN/legal-content/glossary/accession-criteria-copenhagen-criteria.html>.

^②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ffairs, “Enlargement, Two Years after: An Economic Evaluation,” European Economy Occasional Papers 24, May 2006, https://ec.europa.eu/economy_finance/publications/pages/publication_summary7550_en.htm.

^③ “Direct Investment Liabilities (Stocks)—Annual Data, % of GDP,” Eurostat, 2023, <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tipsbp100/default/table>.

^④ Joanna Ciesielska-Klikowska, “Poland Economy Briefing: Weekly Briefing—Industry Overview in Poland,” China-CEE Institute, June 2019, <https://china-cee.eu/wp-content/uploads/2019/06/2019e0674EF%BC%883EF%BC%89Poland.pdf>.

融入西欧产业链的另一个收益是获得了稳定的出口市场。2001 年至今,新成员国对欧盟国家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例稳定在 70%—80%,而自欧盟国家的进口占总进口的比例稳定在 60%—80%。欧盟市场成为新成员国的核心出口市场。^①

经济互助委员会时期经济差距扩大的事实从反面印证了前述路径的有效性,即如果没有经济制度的变革和融入先进生产体系的激励,经济一体化不可能带来经济追赶,这也是为何经济互助委员会是一个失败的经济一体化实验。其一,经济互助委员会和苏联的市场均未提供经济制度变革的激励。事实上,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尚未正式确立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之前,新成员国就已开始推行所有制改革。匈牙利在 1946 年对采矿业和重工业国有化、1947 年对金融业国有化、1949 年对雇员人数超过 100 人的企业国有化。捷克斯洛伐克在 1945 年对化工、冶金、金融等行业国有化,到 1948 年几乎完成了对所有企业的国有化。波兰甚至在 1944 年就开始推行农业集体化,在 1946 年开始推行国有化。此时,经济互助委员会尚未成立。

其二,经济互助委员会未能促进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新成员国在 1949 年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之前就已经开始推行快速工业化战略。一方面,这些国家强制将劳动力从农业转移至工业部门。到 1960 年,波兰有 50%的劳动力在工业部门,匈牙利的这一比例为 60%,而工业基础更为雄厚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这一比例则达到 70%。另一方面,上述国家将更多投资用于发展工业部门。1950—1970 年,新成员国投资占 GDP 的比例持续走高,波兰从 16.2%升至 34.3%,匈牙利从 26.1%升至 34.5%。^②正是得益于本国的发展战略,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这些国家就已先后进入计划经济的黄金时期,而非始于 50 年代的经济互助委员会时期。苏联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才开始考虑进一步深化经济互助委员会内部分工,并于 1971 年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一体化综合计划》(Comprehensive Program for Socialist Economic Integration),企图打造一个苏东集团内部的生产体系,但为时已晚。

(二) 经济一体化对经济追赶的长期阻碍

长期而言,经济一体化向新成员国提供的外部市场和资本是这些国家面对经济危机和经济竞争时的保护伞。这种庇护让新成员国安于现状,产生了一种“参与经济一

^① “International Trade of EU, The Euro Area and the Member States by SITC Product Group,” Eurostat, 2024, 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EXT_LT_INTERTRD__custom_11167991/default/table?lang=en.

^② Matthias Morys, e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entral, East and South-East Europe: 1800 to the Present*, Routledge, 2021, pp.284–288.

体化——依赖经济一体化的庇护——经济发展受阻——继续寻求庇护”的路径依赖。最终,经济一体化的庇护遏制了这些国家进一步开展产业升级转型和持续改进经济制度的意愿,拉大了与西欧生产效率的差距,造成经济追赶的失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关税同盟创造了新成员国对经济一体化庇护的路径依赖。这一庇护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面对经济竞争时的市场保护;二是面对经济危机时的资本保护。一方面,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谷物涌入欧洲市场之时,美国小麦比欧洲大陆的小麦价格低44%左右。^① 新成员国的农业部门毫无还手之力,其既没有达到美国农业较高的机械化程度,也没有沙俄帝国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对此,新成员国选择在帝国内部游说以提高美国谷物的进口关税。这一措施对新成员国的另一个收益是将巴尔干地区的农产品排除出帝国市场。彼时巴尔干地区的谷物、油、面粉、生猪等产品因交通条件的改善而进入奥地利和德国市场。随着关税壁垒的建立,塞尔维亚的生猪及猪肉制品几乎完全从奥匈帝国的市场上消失了。另一方面,即便经历了19世纪70年代奥地利的金融危机,新成员国依旧吸引了大量西欧资本。到1901年,德意志帝国的各大银行拥有奥匈帝国境内12.5%的工业资产。在1867—1913年,匈牙利总投资水平的40%是外来投资(主要来自奥地利),而奥地利对外直接投资的近80%都流向了匈牙利。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法国23%的对外投资和德国52%的对外投资都投向了新成员国。^②

新成员国对关税同盟庇护的依赖阻碍了本国工业的升级转型,拉大了与西欧的生产效率差距。由于保护性市场和资本的存在,新成员国的既得利益者会尽力保持本国作为农产品和初级加工品的分工角色以保障稳定的收益来源。例如19世纪末流入匈牙利的奥地利资本更多是以政府债券和银行贷款的方式,支持已有的农业和食品加工业的扩大再生产,而非鼓励机械制造等能提高生产效率的工业领域,因为前者在关税同盟中可以带来更多收益。^③ 然而,这让新成员国错过了利用西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的机会。到19世纪末,德国每公顷原糖的产出要比奥匈帝国高38%。在奥匈帝国内部,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地区每公顷农业用地的净收入最高,分别为11.3金盾和10.1

^① Kevin H. O'Rourke, "The European Grain Invasion, 1870—1913,"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7, No.4, 1997, pp.775-801.

^② David F. Good, *The Economic Rise of the Habsburg Empire, 1750-191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108.

^③ David Turnock, *The Economy of East Central Europe 1815—1989: Stages of Transformation in a Peripheral Region*, p.71.

金盾,在匈牙利王国为5金盾,最低的是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地区,仅为1.1金盾。到了20世纪头十年,奥匈帝国内部的人均制造业产出水平最高的是下奥地利(1028.9国际元),其次是波希米亚地区(812.3国际元),而匈牙利王国仅为219.3国际元。^①事实上,这些国家是由于苏东集团时期的激进工业化战略才正式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例如波兰在1860—1910年的工业雇员人数从28.7万增长到118.9万,但到了1946年这一数字仅增长到123.5万,而在1960年这一数字翻了近三倍,达到312.8万。^②

经济互助委员会时期的案例同样遵循了这一路径,即体现在面对经济危机时的市场和资本保护。在市场方面,自20世纪40年代末,苏联主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市场逐步取代西欧,成为新成员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到60年代和70年代,对经济互助委员会市场的出口占捷克斯洛伐克总出口的比例稳定在60%以上,占匈牙利和波兰的比例为50%—60%,这也是新成员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贸易重心转移出西欧地区。^③到20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滞胀之时,由于新成员国严重依赖苏联的廉价能源,且本国出口产品在西方市场的竞争力十分有限,这些国家只得将更多工业产品出口至苏联,以换取低于全球市场价格的能源。在资本方面,苏联在此期间成为这些国家的最大单一债权人。1971—1980年的短短10年间,波兰自苏联获得的债务及各类补贴之和达到364亿美元,仅次于东德(384亿美元),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规模分别为165亿美元和185亿美元。到1980年,源自苏联的债务规模占捷克斯洛伐克总债务的85%,在匈牙利和波兰则分别占比61%和43%。^④

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庇护进一步拖慢了新成员国经济制度变革的步伐,阻碍了这些国家生产效率的提高。遗憾的是,从苏联获得的低价能源和资本并未被用于提高经济竞争力以应对经济危机,而是用于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匈牙利卡达尔政府在大规模举债后将其用于进口更多消费品,以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波兰盖莱克政府将外汇用来

^① Alexander Klein, Max-Stephan Schulze and Tamás Vonyó, “How Peripheral was the Periphery?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Central Europe since 1870,” in Kevin H. O’Rourke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eds., *The Spread of Modern Industry to the Periphery since 187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63-90.

^② Antoni Kukliński, “Industrialization in Poland — Experiences and Prospects,” *GeoJournal*, Vol.18, No.2, 1989, pp.141-150.

^③ Sándor Richter, “Economic Integration within COMECON and with the Western Economies,” in Matthias Morys, e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entral, East and South-East Europe: 1800 to the Present*, pp.324-332.

^④ Valerie Bunce,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The Evolution of The Eastern Bloc from a Soviet Asset to a Soviet Liabil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9, No.1, 1985, pp.1-46.

盲目建厂扩产,终因产品与市场需求不匹配而造成资源严重浪费。到1989年东欧剧变之时,匈牙利的人均债务水平在所有东欧和拉美国家中最高,达到1939美元,波兰为1102美元,排名第四。^①对资本的错误配置最终导致生产效率和产品竞争力的低下。到1980年,新成员国每创造1000美元GDP所消耗的煤炭量是西德、法国和奥地利的两倍,消耗的钢铁量是上述国家的三倍。^②生产效率低下导致新成员国的产品缺乏竞争力,在西方市场中的份额不断缩水,从1980年的3.19%下滑至1987年的2.38%。其最重要的出口产品——机械和交通设备的份额从原本就少得可怜的0.88%下滑至0.48%。^③

第三个案例表明,即便在未参与经济一体化的时期,新成员国仍需依靠庇护性外部市场和资本解决本国的经济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民族自觉的理念下,新成员国大力推行经济自给自足和进口替代。从表面上看,这种经济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让新成员国步入“咆哮的20年代”,但这并不代表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实现了独立。外部资本方面,匈牙利和波兰在20世纪20年代基本处于贸易逆差地位。匈牙利逆差额占其总贸易额比例在1920年达到峰值43.5%,而波兰在1928年达到峰值14.6%。虽然捷克斯洛伐克一直保持净出口,但其顺差规模不断缩水,从1922年顺差额占比的峰值18.5%一路下滑至1929年的1.3%。^④与经济互助委员会时期类似,新成员国只能通过借贷外债来缓解对外贸易形势的恶化。在20世纪20年代,约有13亿以固定利率贷款和短期信贷为主的美元流入该地区,致使各国债台高筑。1924—1930年,匈牙利外债的增速最快(802.6%),其次是波兰(334.7%)。由于工业品出口竞争力较强,捷克斯洛伐克外债增速仅为32.4%。到1930年,匈牙利人均外债规模从45万美元飙升至405万美元,波兰从38万美元升至167万美元,捷克从100万美元升至133万美元。^⑤因此,新成员国早在大萧条到来之前就已陷入债务危机。

面对债务危机,新成员国继续采用老办法,即寻求新的保护性市场,回归战前帝国

^① Gabor Oblath, “Hungary’s Foreign Debt: Controversies and Macroeconomic Problems,” in István P. Székely and David M. G. Newbery, eds., *Hungary: 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20.

^② William V. Wallace and Roger A. Clarke, *COMECON, Trade and the West*, St. Martin’s Press, 1986, pp.111–123.

^③ Michael Friedlander, *Foreign Trade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Routledge, 1990, p.146.

^④ Katherine Barbieri and Omar M. G. Keshk,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Trade Data Set Codebook,” Version 4.0, 2024, <https://correlatesofwar.org/data-sets/bilateral-trade/>.

^⑤ Matthias Morys,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Central, East and South–East Europe 1918–1939,” in Matthias Morys, e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entral, East and South–East Europe–1800 to the Present*, pp.161–187.

时期的分工角色。借债发展经济的模式原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于丧失帝国出口市场和生产资料来源地所带来的损失,但20世纪20年代末全球农产品价格的下跌显著减少了新成员国最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加之1929年10月华尔街股票市场的崩盘及随之而来的全球资本枯竭,新成员国开始寻求新的保护性市场,而这恰好与纳粹德国的需求不谋而合。例如纳粹德国在1931年6月与匈牙利签署贸易协定,对匈牙利粮食与牲畜实行优惠关税,而匈牙利则对自德国进口的工业品实行优惠关税。1933—1935年,德国将这一优惠关税协定扩展为易货贸易协定并采用双边清算的方式结算,这大大缓解了匈牙利的外汇压力。1929—1938年,德国成为新成员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新成员国与德国的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比例保持在20%以上,1932年达到最高值(26%)。新成员国与其他西欧国家的贸易占比也从1924年的27%升至1937年的35%。^① 总之,虽然新成员国在战后纷纷独立,但经济上再次回到战前的分工角色,即成为农产品和初级工业品的供应者并依赖德国提供的保护性市场。可见,即使实现了民族国家的独立,但新成员国仍未能摆脱战前自身在经济一体化中的命运,更未能真正实现经济上的独立。

(三) 成功的经济追赶与经济一体化

芬兰和爱尔兰成功的追赶历程从反面印证了本文的观点,即较少参与或不依赖经济一体化庇护的后发国家更有可能实现经济追赶。芬兰和爱尔兰与欧盟新成员国的可比性在于:一方面,芬兰和爱尔兰在19世纪初相对西欧和德国均为后发国家。两国在1820年的人均GDP水平与捷克斯洛伐克相当(1353国际元),芬兰为1313国际元,爱尔兰为1398国际元。^② 另一方面,芬兰和爱尔兰的初始工业化进程同样源于外部技术的引进,且引入的时间与新成员国相近。蒸汽技术进入芬兰和爱尔兰的时间均为19世纪40—50年代。然而,芬兰和爱尔兰的经济追赶成绩却与新成员国大相径庭。两国分别在20世纪中叶和末期成功从后发国家集团跻身先发国家之列,追赶上西欧和德国。这一令人瞩目的经济追赶成绩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国望尘莫及。

芬兰的案例表明,不依赖经济一体化或减少对经济一体化的依赖均有助于应对经

^① Nathan Marcus, Stefan Nikolić and Tobias Straumann, “Economic Policy 1918—1939,” in Matthias Morys, e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entral, East and South-East Europe—1800 to the Present*, pp.188–215.

^② 麦迪森经济史数据库, <https://www.rug.nl/ggdc/historicaldevelopment/maddison/releases/maddison-project-database-2020?lang=en>.

济危机和保证经济追赶的长期稳定。在 1809—1917 年归属沙俄帝国的时期,芬兰并不是帝国关税同盟的一员。彼时沙俄对芬兰制造业产品实行关税配额,而芬兰也单独对自德国进口的谷物实行免税。在没有关税同盟限制的条件下,西欧对芬兰圆木、锯材和生铁的需求扩大了芬兰原有的林业和矿业规模,而沙俄对纺织品和纸制品的需求推动了芬兰纺织业和造纸业的兴起。到了 19 世纪末,英国和德国已超越沙俄成为芬兰前两大贸易伙伴。^① 得益于此,在 1917 年俄国革命和 1918 年独立战争期间,芬兰并不担忧俄国切断与本国的贸易,反而受益于俄国资本从本土工业中的退出。芬兰借机迅速控制了本国工业并扩大了对西欧市场的出口,进而带来了显著的经济追赶效果。^② 在沙俄帝国灭亡后的 10 年中(1920—1930 年),芬兰人均 GDP 占西欧和德国的比例分别上升 6 个和 1 个百分点。反观同属沙俄帝国且加入帝国关税同盟的波兰会议王国,在同一时期的两个占比分别下滑了 10 个和 17 个百分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芬兰的经济发展重复了这一路径。战后初期,芬兰未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欧洲经济共同体或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但该国是第一个同苏联签订长期贸易协定的西方国家(1951 年首次签署并多次续签直至苏联解体)。在芬兰的对外贸易结构中,苏联的份额不断增长。到了 1982 年,芬兰对苏联出口占芬兰总出口的比例达 26.6%,自苏联进口占比达 24.6%。正是由于芬兰与西欧和苏联市场的联系,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经济滞胀时期,西欧市场羸弱的需求被苏联市场所弥补。1950—1970 年,芬苏贸易额增长 4 倍,1970—1980 年则增长 10 倍。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市场对机械设备的需求促进了芬兰的船舶制造、机械制造、化工等产业的兴起。^③ 与此同时,与西欧市场的联系使芬兰发展了信息技术产业,例如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成功崛起的诺基亚。最终,芬兰在 1990 年的人均 GDP 首次超过西欧,占比达 105.7%。反观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欧盟新成员国,这些国家在西方滞胀时期同样选择加强与苏联的经济联系,但这种依赖性的增强导致其与西欧和德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爱尔兰的案例表明,经济一体化中的后发国家只有降低对一体化内部的先发国家

^① Reino Tapio Hjerpe and Riitta Tuulikki Hjerpe, "The Economy of the Grand Duchy of Finland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s 1917," *Ekonomiĉeskaĉ istoriĉ*, Vol.13, No.4, 2017, pp.9-18.

^② Pekka Ylä-Anttila and Christopher Palmberg,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Policy Transformations in Finland," *Journal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and Trade*, Vol.7, No.3-4, 2007, pp.169-187.

^③ Gábor Oblath and Peter Pete, "Trade with The Soviet Union: The Finnish Case," *Acta Oeconomica*, Vol.35, No.1/2, 1985, pp.165-194.

的依赖,加之自身改革,才有望实现经济追赶。起初,爱尔兰在 1801—1912 年与先发达国家——英国先后建立了自贸区、关税同盟并最终在 1826 年统一了货币,形成一体化程度更深的经货联盟。与欧盟新成员国类似,爱尔兰在经济上严重依赖英国。即便爱尔兰在 1921 年独立后结束了与英国的经济一体化联系,1924 年依旧有 99% 的出口流向英国,到 1950 年,这一比例仅下降 6 个百分点。与英国将近一个世纪的经济一体化拖慢了爱尔兰工业化的步伐,让爱尔兰成为英国经济衰落的受害者。^① 1870—1913 年,欧盟新成员国以及南欧国家的制造业年均产出增速均在 3% 以上,而爱尔兰仅为 1.1%。^② 因此,爱尔兰在 20 世纪初之前的经济追赶表现也与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类似,其人均 GDP 占西欧和德国的比例与初始状态基本相仿。

然而,爱尔兰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创造了被称为“凯尔特之虎”(Celtic Tiger)的经济奇迹并成功实现经济追赶,这主要归功于自身改革和来自欧洲经济一体化之外的先发达国家的激励。首先,爱尔兰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就启动改革以提振经济,先后成立工业发展署(Industrial Development Authority)、取消对制造业外资所有权的限制,并改革企业税收体系。与此同时,跨国企业在爱尔兰入盟后将该国视为进入欧盟市场的跳板,因而大举进军爱尔兰。1983 年,外资企业的总产出占该国总产出的 57%,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占该国总就业人数的 38%。到 1998 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 82% 和 47%。^③ 其次,爱尔兰的经济奇迹还与美国等欧洲经济一体化之外的先发达国家息息相关。爱尔兰并没有如新成员国那样,被英法德等欧盟内先发达国家的资本与市场所捆绑,因而没有与这些国家的产业链过度融合。早在 20 世纪初,美国就已成为爱尔兰最重要的直接投资来源国。1993 年,美国五大高科技企业的产出占爱尔兰当年制造业总产出的 43%,而到 1996 年,这一比例上升至 53%。^④ 目前美国是在爱尔兰投资存量最多的国家,据称达两万亿美元。美国也是爱尔兰第一大出口对象国,对美出口占爱尔兰总出

^① John Bradley, “Irish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n Leszek Balcerowicz and Stanley Fischer, eds., *Living Standard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Successes and Failures in Real Convergence*, MIT Press, 2006, pp.309–327.

^② Seán Kenny, Jason Lennard and Kevin H.O’ Rourke, “An Annual Index of Irish Industrial Production, 1800—1913,”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76, No.1, 2023, pp.283–304.

^③ Bence Horak, “Using Stones to Build Stairs—The Story of the Irish Economic Miracl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view*, Vol.23, No.1, 2024, pp.167–181.

^④ Antoin E. Murphy, “The ‘Celtic Tiger’—An Analysis of Ireland’s Economic Growth Performance,” EUI Working Paper RSC, No.2000/16, https://cadmus.eui.eu/bitstream/handle/1814/1656/00_16.pdf.

口的28%。此外,美国企业在爱尔兰的数量占爱尔兰所有外企数量的一半左右。^①

总之,芬兰和爱尔兰的案例从反面表明,经济一体化的确会阻碍后发国家的经济追赶。如较少参与经济一体化或在经济一体化中寻求一种不依赖于一体化的增长模式,那么后发国家仍有望实现经济追赶。当然,本文并非在暗示,只要较少或者不参与经济一体化,就必然能够实现经济追赶。一个成功的经济追赶需要很多因素才能触发,而经济一体化仅仅是影响后发国家经济追赶的其中一个因素而已。本文谨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研究欧盟新成员国——这一组在发达国家集团中的相对后发国家的经济追赶问题。

五 经济一体化中的后发劣势与欧洲经济一体化

经济一体化对新成员国经济追赶的长期阻碍,是因为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外部市场和资本两大因素替代了后发优势理论中技术和制度的作用。对作为后发国家的新成员国而言,这种来自经济一体化的替代是一种新的后发劣势。

(一) 经济一体化中的替代与后发劣势

由于不具备先发国家实现经济追赶的前提条件,新成员国只能寻求某种解决方案以替代这些条件所发挥的作用。那些激励先发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追赶的前提条件在后发的新成员国并不存在。例如英国依靠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技术以及此前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实现工业化。德国则可以依靠其强大的银行体系和对技术的吸收能力实现工业化。而在更为落后的欧洲大陆东部,情况则完全不同。匈牙利第一家本土的现代银行——佩斯匈牙利商业银行(Hungarian Commercial Bank of Pest)直到1840年才正式成立,而自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又经过近一个世纪,蒸汽动力技术才传入匈牙利。因此,正是由于经济落后的独特性,新成员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需要采取不同于西欧国家的方式,但对这些国家而言并不陌生。在工业化较早兴起的捷克斯洛伐克,早在13世纪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公国(Duchy of Bohemia-Moravia)时期,该国便利用德国移民推动了本地采矿业的兴起。最终,与格申科龙所指的“替代”不同,新

^① “US Investment: Ireland’s Economic Driver Brings Enormous Benefits,” *The Irish Times*, 23 November 2023, <https://www.irishtimes.com/special-reports/2023/11/23/us-investment-irelands-economic-driver-brings-enormous-benefits/>.

成员国所选择的替代方案是引入来自西欧的外生因素,而格申克龙强调的是内生因素之间的替代,例如国家替代金融市场和银行。

实现替代的捷径是参与经济一体化。当新成员国的工业革命姗姗来迟之时,各大帝国提供了一种简单快速的解决方案,即借助经济一体化让帝国资本流入新成员国的工业和农业,以替代匮乏的本土资本,并让整个帝国市场的需求带动新成员国的工业扩张,以替代羸弱的本土需求。对这些新成员国的既得利益者而言,这是一个低成本、高收益的方案。一方面,这些既得利益者无须将已有资源从农业转移至新兴的工业部门,以避免投资新兴产业导致的损失;另一方面帝国的需求也会带动农业的扩张,能够保障这些既得利益者在农业这一最大产业部门扩大收益。因此,这些既得利益者很快接受了与帝国结成关税同盟的提议。

经济一体化的庇护加强了替代的作用,这就是经济一体化中的后发劣势。虽然经济一体化为新成员国带来了更多收益,但新成员国并未将其用于吸收先进技术和改进制度,反而被既得利益者用于维持已有收益,这僵化了经济制度和产业结构,拉大了新成员国与西欧的经济效率差距。对既得利益者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更多是一种危机的解决方案,而非有意设计的经济政策。面对经济危机或经济竞争,这一群体将会继续采取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即寻求新的经济一体化,这样既能利用新的经济一体化解决经济危机,又能避免对制度进行改革,规避因改革而产生的损失。这就决定了那些能够长期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追赶的因素,例如技术、制度、教育、创新等,均被置于次要位置。总而言之,既得利益者更加关心如何在经济危机或经济竞争中保住自己的地位,而非国家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

(二) 欧洲经济一体化与后发劣势

第一,欧洲经济一体化给新成员国带来的后发劣势可能更为严重。首先,新成员国在欧洲经济一体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历史上几近无异,其既是欧盟重要的农产品和原材料供应地,又是西欧制造业的加工组装基地,被称为德国制造业的“后花园”。新成员国的对外贸易也依旧主要面向欧盟市场。2023年,新成员国对欧盟市场的贸易额占其总贸易额的比例为67%—79%,其中斯洛伐克最高(79.4%),波兰最低(67.5%)。^①因此,新成员国会继续依赖欧洲经济一体化来发展经济。其次,新成员

^① “International Trade of EU, The Euro Area and the Member States by SITC Product Group,” Eurostat, 2024, 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EXT_LT_INTERTRD__custom_11167991/default/table?lang=en.

国对当前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依赖比历史上对任何一次经济一体化的依赖程度更深。单一市场内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四大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让外生因素更容易进入新成员国,这加强了经济一体化对新成员国技术和制度的替代作用。最后,欧盟基金对新成员国而言是巨大的外部资本来源,这也是与此前经济一体化最大的不同之处。鉴于此,在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而新成员国的角色并未发生转变的情况下,单一市场乃至经货联盟带来的后发劣势可能更为严重。

新成员国的经济数据也为我们提供了参考。从1990年(东欧剧变后的第一年)至2005年(欧盟东扩后的第一年),新成员国人均GDP的增幅要高于2005—2018年的增幅。例如捷克在前一时间段的增幅为56.1%,而在后一时间段的增幅为39%,波兰分别为91.2%和76.2%。^①这表明,新成员国在转轨衰退期的经济追赶幅度要大于参与单一市场后的追赶幅度。依照本文对经济一体化的判断,当前的欧洲经济一体化将会对新成员国的经济追赶产生更大的阻碍作用,造成新老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扩大,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最终影响还需进一步观察。原因有三:一是新成员国参与单一市场和经货联盟仅20年,而历史上这些国家参与其他两次经济一体化的时间至少为40年。二是欧洲经济一体化尚处于变化发展的过程中。例如当前欧盟和西欧国家正在探讨如何进一步加深经济一体化,认为更深层次的一体化能够解决当前欧洲经济竞争力下滑的问题,但新老成员国对此立场不一。三是新成员国能否借助第四次工业革命摆脱经济一体化的负面影响,这一问题也尚未定论。

第二,即便后发劣势存续至今且可能加剧,新成员国仍难以摆脱对当前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依赖。一方面,这种依赖超越了经济制度及其变迁。新成员国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内实践了各类经济制度,从自由放任、管制经济、统制经济再到中央计划经济,也历经或渐进式或休克式的制度变迁。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前,新老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而东欧剧变让新成员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时间最短、程度最深的转轨,更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制度红利。诚然,转轨的积极影响不容否认,其让新成员国即便是在转轨衰退期仍取得较好的经济追赶成绩。然而,近两个世纪各类经济制度实验,包括转轨在内,并未改变这些国家的经济追赶模式,即在经济一体化中寻求经济追赶。转轨后的新成员国再次加入新的经济一体化进程,重新回到

^① 麦迪森经济史数据库, <https://www.rug.nl/ggdc/historicaldevelopment/maddison/releases/maddison-project-database-2020?lang=en>。

欧洲生产体系的上游位置。这表明,对经济一体化庇护的依赖已经超越经济制度而存在,不会因为经济制度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因此,转轨仅仅是新成员国近两个世纪经济追赶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事件,并未让这些国家摆脱对经济一体化庇护的长期依赖。

另一方面,新成员国的历史教训之一就是本国无法在对经济一体化严重依赖的条件下实现经济独立。在19世纪下半叶欧洲民族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新成员国曾一度认为只有民族自决与经济独立齐头并进,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国家的崛起。彼时,新成员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府也打着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旗号实行进口替代等经济政策。然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验表明,民族自决与经济独立齐头并进的观念是错误的,两者没有必然联系。新成员国必须通过经济一体化才能应对经济危机。自给自足和进口替代更多适用于德国和英国这类工业体系较为完备、资本较为充足的发达经济体,在新成员国这种依赖农业、初级工业产品出口的经济体中很难成功。因此,东欧剧变和经济互助委员会解体之后,新成员国立刻转向单一市场。即便是匈牙利这种如今频繁批评欧盟的成员国,也从未公开提出退欧。

第三,新成员国在当前欧洲经济一体化中的后发劣势问题将会进一步丰富关于经济追赶和后发劣势问题的研究。首先,扩展了研究对象。传统上,经济追赶问题的研究对象集中在俄国、德国等历史上的后发国家以及非洲、东南亚、拉美地区等当下的后发国家。但落后是相对的,在发达国家集团中依旧存在相对落后的国家,且这些国家由于相对落后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等而出现民粹主义热潮,并对本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欧盟新成员国的经济追赶问题值得持续关注。其次,扩大了已有的研究议题。目前关于经济追赶问题的研究集中于单个或某些国家集团,探究那些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各类因素与经济追赶的关系。但本文的研究表明,经济一体化本身也会作为一种因素作用于经济追赶,且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其对经济追赶的作用也可能发生变化。最后,本文认为,后发劣势不仅源于杨小凯提出的制度模仿不足。新成员国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内,先后效仿了西欧和苏联的各类政治和经济制度,但未能消除源于经济一体化本身的后发劣势。

六 结论

经济一体化对经济追赶的作用是一致的、连贯的且明确的,即经济一体化给作为

后发国家的欧盟新成员国带来了后发劣势,进而阻碍了经济追赶,使这些国家在两个世纪的时间内从“边缘”到“边缘”。本文利用经济史分析方法和后发优势理论考察长期的经济追赶问题,详尽分析了波兰、匈牙利、捷克及斯洛伐克在1820—2018年的经济追赶成绩,揭示了欧盟新成员国在经济一体化中的经济追赶历程及其失败的原因。本文提出,作为后发国家的新成员国短期内的确从与西欧的联系中受益。西欧的技术和市场引发了新成员国的经济制度变迁,而西欧主导的经济一体化又推动了新成员国的初始工业化,改变了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使其融入先发国家已有的生产体系,进而引发了经济追赶。然而,这种短期的收益仅仅是基于后发劣势的一种暂时现象。新成员国逐渐依赖经济一体化带来的保护性市场和资本,以应对经济危机和经济竞争,并产生了“参与经济一体化——依赖经济一体化庇护——经济发展受阻——继续寻求庇护”的路径依赖。经济一体化的庇护降低了新成员国持续推进产业升级转型和改进经济制度的意愿,最终拉大了这些国家与西欧生产效率的差距,造成经济追赶的失败。本文认为,新成员国对经济一体化的路径依赖替代了技术和制度本应发挥的作用,而这种替代正是经济一体化中的后发劣势。在经济一体化中,新成员国对技术和制度的重视已居于次要地位。因此,欧洲经济一体化并不如欧盟所描绘的那样美好,远非促进新成员国经济追赶的法宝。恰恰相反,欧洲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后发劣势可能比以往更加严重,因为这种后发劣势超越了经济制度,也会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而加深。然而,即便如此,新成员国依旧难以摆脱对经济一体化的路径依赖,更难以摆脱经济一体化中的后发劣势。未来,欧盟新成员国能否摆脱这一经济一体化的“诅咒”,尚需进一步观察。

(作者简介:马骏驰,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责任编辑:齐天骄)